巴孛的使命

回顧1844-1994

道格拉斯·馬丁

本文最初發表於1994-5期《巴哈伊世界》，作者道格拉斯·馬丁主要考察了巴孛啟示對於當時及後來的西方作家的影響。

本文已為台灣讀者稍作編輯。

作者注：本人對穆罕默德·阿夫南醫生/博士和伊麗沙白·馬丁女士在撰寫此文過程中給予的建議和協助感激不盡。

1994年是巴哈伊信仰的創教雙聖之一巴孛(賽義德·阿里－穆罕默德，1819-1850)宣示其使命150周年。這一大事件，當時幾乎不為其發生地——那個遙遠而墮落的社會——以外的人所知，但卻產生了超乎尋常的歷史性影響，對此進行全面的回顧正合時宜。

19世紀上半葉對於伊斯蘭世界來說，是一個期待彌賽亞降臨的時期，基督教世界的許多地方亦是如此。在波斯，一種信奉千福年說的熱潮衝擊了什葉派穆斯林社會中的宗教教育階層的許多人，其核心信仰是相信《古蘭經》和伊斯蘭聖訓中的預言即將實現。1844年5月22-23日間的那個夜晚，巴孛(此稱號意為「大門」)就是向這樣一個熱切尋找彌賽亞的人[1]，

宣佈祂本人就是那不僅將轉變伊斯蘭、還將為整個人類的靈性生活設定新方向的神聖啟示的傳遞者。

在隨後的十年中，來自神權和政權的反對愈來愈嚴重，最終導致巴孛殉道、其首要門徒和成千上萬名信徒遭屠殺，巴孛創立的宗教體系幾遭滅絕。然而，在這些悲慘之年中，卻繼而興起了一種新的運動——巴哈伊信仰；時至今日這種信仰已傳遍全球，並明確宣佈它是一種新興的、獨立的、世界性的宗教。

巴哈歐拉(米爾紮・侯賽因－阿里，1817-1892)是全世界巴哈伊社團心目中的靈性教義和社會教義之源頭，是塑造巴哈伊社團生活的律法和機構之權威，是將巴哈伊社團凝聚為地球上

巴孛宣示其使命的房間

地理分佈最廣、種族多樣性最大的人類組織體的團結之希望。巴哈伊信仰的名字來源於巴哈歐拉，全世界數百萬巴哈伊每日向上帝祈禱時心思所系的聖地也是巴哈歐拉的安息之所。

這些情況所無法削弱的事實是：這新信仰是誕生於那籠罩巴孛的短暫使命期的血腥和恐怖之中的，巴孛和祂那群英勇信徒的生命中所展現的自我犧牲精神一直在激勵巴哈伊將信仰傳播到全世界。巴孛所啟示的祈禱文和大量著作，是各地巴哈伊的禮拜生活的一部分。巴孛使命期內的大事件已成為數以萬計的地方巴哈伊社團每年慶祝的聖日[2]。在卡梅爾山坡上，那金色圓頂的巴孛陵殿，即其遺骸的安放之所，聳立於巴哈伊信仰國際活動的行政中心屬下的宏偉建築和花園之間。

然而，在當代公眾對巴哈伊社團及其諸多活動的意識之中，巴哈歐拉的生平和事蹟極大地遮蔽了巴孛的生平和事蹟。從某種意義上講，這種情形也是自然而然的，鑒於巴哈歐拉的主要地位就是兌現巴孛的承諾和充當巴哈伊信仰之進步的設計師。不過，在一定程度上，這種情形也反映了新宗教從默默無聞到登上歷史舞臺的緩慢得令人心痛的過程。對此，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Toynbee)的評價極有見地，他將巴哈伊信仰在大多數西方國家得到的認識程度與基督傳教團在基督逝世後大約300年間對羅馬帝國的知識階層所產生的有限影響作了類比[3]。既然過去幾十年中巴哈伊社團的大部分公共活動都集中在介紹巴哈歐拉帶來的福音、闡述其社會教義對於社會生活的意義這一艱巨任務上，那麼該信仰的19世

紀波斯起源就很容易在公眾的意識中被暫時忽略了。

即便對於巴哈伊來說，接受「我們這個時代見證了兩位幾乎同時降臨的上帝使者的出現」這一超乎尋常的觀念，也仍然是一種挑戰。巴哈歐拉描述說，此現象是這新宗教的顯著特色之一，也是上帝為人類之統一和全球文明之建立所設定的大計畫的核心奧秘。[4]

在巴哈伊的文明演進觀中，有一個根本性的類比是巴孛和巴哈歐拉的著作中都出現過的。它將人類種族逐漸走向文明的過程和人類的任一個體必將經歷嬰兒期、兒童期、青春期和成年期的過程作了類比。這一觀念有助於巴哈伊看清楚其宗教的兩位創始人的先後使命期的

關係。

巴孛和巴哈歐拉都說——前者說得含蓄而後者說得明確——人類種族正站在其集體成熟期的邊緣。巴孛的地位是上帝使者，除此之外，祂的來臨還標誌著人性的完善過程終成正果——而這是幾千年裡神聖啟示的培養所帶來的。在此意義上，祂的來臨可被視為人類肩負起成熟之責任時所必須邁過的大門。其出現之短暫本身似乎就象徵著過渡期的相對突然性。[5]

在個體層面，只要一個人在自身發展過程中跨過了成熟期的關鍵門檻，挑戰與機遇就會向其致意。人類個體生命中新出現的潛能，現在必須體現為長年累月的責任與成就：責任與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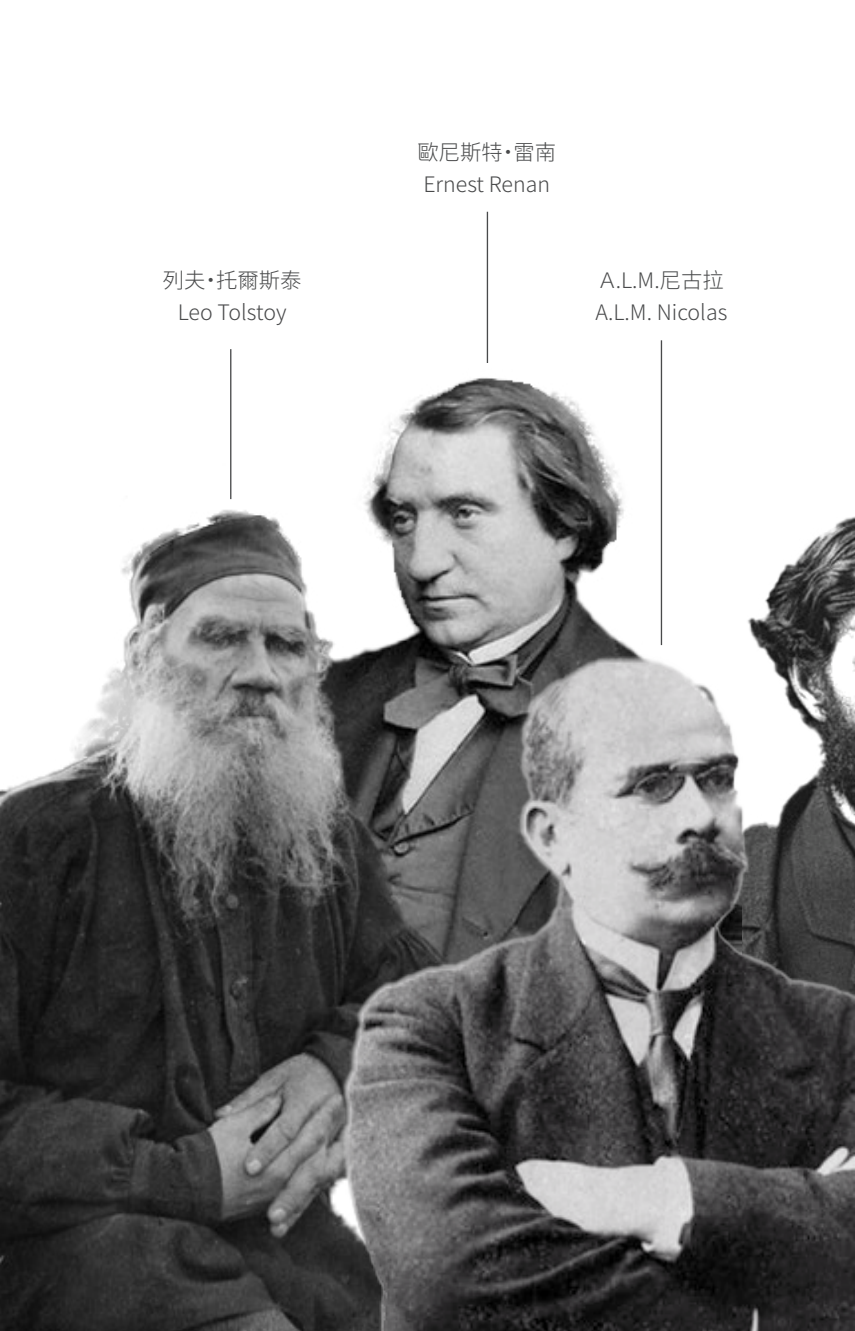
就，必須通過婚姻、職業、家庭和服務社會來實現。而在人類集體生命中，這是巴哈歐拉——這位世界上所有宗教的經文中所預言的上帝的普世使者——的使命。

然而，直到19世紀末，在大多數意識到此新宗教之存在的西方人中，巴孛一直被視為此新宗教的中心人物。法國文學批評家儒勒·布瓦(Jules Bois)在1925年的美國期刊《論壇》(Forum) 上發表文章回憶19世紀末巴孛的故事對於歐洲教育階層的觀念產生的深刻影響：

> 全歐洲都激蕩著憐憫和義憤……在我們這一代文學家中，巴孛殉道的故事在1890年的巴黎，就像1850年他死亡的消息最初傳來的時候一樣，依舊是個新鮮

的話題。我們寫詩紀念祂。薩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懇求卡蒂勒·孟戴斯(Catulle Mendès)根據這一歷史悲劇創作一齣戲劇。[6]

眾多作家，如約瑟·亞瑟·得·戈賓諾(Joseph Arthur de Gobineau)、愛德華·格蘭維爾·布朗(Edward Granville Browne)，歐尼斯特·雷南(Ernest Renan)、阿萊克桑卓·吐曼斯基(Aleksandr Tumanskiy)、A.L.M.尼古拉(A.L.M. Nicolas)、維克多·羅森(Viktor Rosen)、克萊蒙·華特(Clément Huart)、喬治·庫茲恩(George Curzon)、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列夫·托爾斯泰(Leo Tolstoy)等，都受到了19世紀中葉發生在波斯的這出靈性戲劇的影響。直到本世紀初「巴哈伊聖道」這個早在


歐尼斯特·雷南
Ernest Renan
列夫·托爾斯泰
Leo Tolstoy
A.L.M.尼古拉
A.L.M. Nicolas

馬修·阿諾德
Matthew Arnold

約瑟·亞瑟·得·戈賓諾
Joseph Arthur de Gobineau

愛德華·格蘭維爾·布朗
Edward Granville Browne)

喬治·庫茲恩
George Curzon

1860年就已被新信仰採用的名字才取代了西方通用的巴比運動這一名稱。[7]

有人認為如此情形實屬必然，這無疑反映出巴孛短暫而波瀾壯闊的一生幾乎高度契合並體現了19世紀上半葉主導歐洲人思想的那些文化理想，並在後來的幾十年中對於西方人的想像力產生了多麼強大的影響。在19世紀的前五六十年中，通常用來形容歐洲文化和智識發展的概念是浪漫主義。到本世紀初，歐洲思想開始超越其啟蒙運動以來的枯燥的理性主義和機械主義的先入之見，趨向於探索存在的其他維度：審美的、情感的、直覺的、神秘的、「自然的」、「非理性的」多種維度。文學、哲學、歷史、音樂和藝術都強烈地回應，並逐漸對於大眾思維產生了同化的影響。

在英格蘭，這種趨勢從世紀之初已逐漸增強，其結果之一是抒情詩的湧現——這也許是英語文學史上最輝煌的抒情詩創作浪潮。在此之後的二三十年中，這些早期認識在西歐各地都得到了強有力的回應。一種重組事物的新秩序，一個全新的世界，已近在咫尺，只要人有膽識去踐行時代之所需。詩人、藝術家和音樂家，經此前幾十年知識階層的劇變而獲得了思想解放，將他們自己視為傳達那潛藏在人類意識之中並渴求得到表現的人類巨大創造力的聲音，視為塑造新的人性觀和社會觀的「先知」。由於傳統宗教的正確性現在蒙上了懷疑的陰影，來自古典時代的神秘人物和事件被喚醒，成為表達這種英雄主義理想的工具：

要承受那希望眼中永無盡頭的痛苦；
要原諒比死亡和黑夜還要黑暗的冤屈；
要反抗那貌似全能的力量；
要愛，要忍耐；要希望，直到希望
從自己的廢墟中創造了它所遙望的事物……
這，惟有這，才是生命，歡樂，帝國和勝利。[8]

在美洲，同樣的渴望也在內戰即將爆發之前甦醒了，並將在公眾意識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所有的超驗主義者都被東方神秘主義文學深深吸引了：《薄伽梵歌》、《羅摩衍那》、《奧義書》以及伊斯蘭大詩人魯米、哈菲茲和薩迪的作品。這種影響在愛默生的《神學院獻辭》這一名篇中可見一斑：

我期盼著一個時刻，那至高聖美，那陶醉了這些東方人的靈魂——主要是希伯來人的靈魂——並借這些東方人的唇舌宣講神諭的至高聖美，也能在西方宣講……我期盼著一位新導師，他恪守那些光明閃耀的律法達到極致，以至於他能夠看見律法的圓滿；……他看見這世界乃是靈魂的鏡子；他看見心靈的純潔如同引力法則一般；他還讓人們看到義務與科學是同一件事，義務與美是同一件事，義務與歡樂是同一件事。[9]

早期浪漫樂觀主義曾經激發了革命的熱情，可是在後來的若干年中，它卻越來越深地陷入接連不斷的失望和挫敗的泥淖中。在科學和技術改變的壓力之下，啟蒙理論最初催生的唯物主

義哲學文化，逐漸實現了自身的固化。到世紀中，戰爭和革命動亂進一步導致了「現實主義」的情緒，即承認偉大理想必須設法與頑固的人性相妥協。

可是，即使在維多利亞時期公共對話的相對清醒氛圍中，浪漫主義的渴求在西方意識中仍然保留了強大的影響力。它們產生了一種靈性衝動的易受力，它雖然不同於世紀初若干年所呈現出來的接受力，卻開始影響廣大公眾。如果說普羅米修士這一革命人物已不再符合英語世界對時代的理解，那麼亞瑟傳奇則吸引了大眾的寄望，它融合了青年期的理想主義與成熟期的洞見、恰到好處地俘獲了數百萬人的想像力:

舊秩序變了，讓位於新秩序；
上帝實現自己的承諾有多種方式，
以免一種優良傳統腐化整個世界。[10]

隨著19世紀後期西方人越來越熟知巴孛的故事，祂的形象對於這種文化環境中形成的思維來說，自然有一種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尤其吸引人的是祂生命的純粹，那是一種一塵不染的品格的高貴，正是這種品格的高貴征服了祂的許多同胞——他們中間許多人起初是質疑者或敵對者，最後卻留在祂身邊，為祂的聖道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巴孛對祂的首批門徒所說的話，就表明了祂為響應其號召者所設立的道德標準：

> 清洗你們的心，滌除那塵俗的欲望，讓那天使的美德作你們的裝飾。……滿足於空洞無聊之頂禮膜拜的時代已然結束。此時刻已來臨：惟動機純潔並經無瑕行為證明者，始能升近至高者的寶座，承蒙祂的悅納。……懇求主，你們的上帝，不要賜給你們那些可能把那流經你們的恩典從純潔變得污濁、從甘甜變得苦澀的塵間的羈絆、俗世的愛欲和短暫的追求。[11]

心靈的純潔，與西方觀察者所深深景仰的自我犧牲的勇氣和意願相得益彰。歐尼斯特·雷南等人的評論，順理成章地將巴孛的生平與基督耶穌的生平相提並論。正如巴孛生命的最後時刻那異乎尋常的一幕所令人信服地展示的[12]，

巴孛本來可以利用其敵對者的愚蠢和群眾的迷信，輕而易舉地解救自己並反過來掌控那些迫害他的人。祂不屑於此，一旦遵照上帝的意志圓滿地完成了祂的使命，祂就心甘情願地慷慨赴死。祂那些擺脫了一切塵世牽絆的追隨者們，遭到敵對者殘忍的屠殺——這些敵對者曾對著古蘭經起誓決不傷害他們的性命與名譽，卻可恥地連他們身後的妻兒也不放過。雷南寫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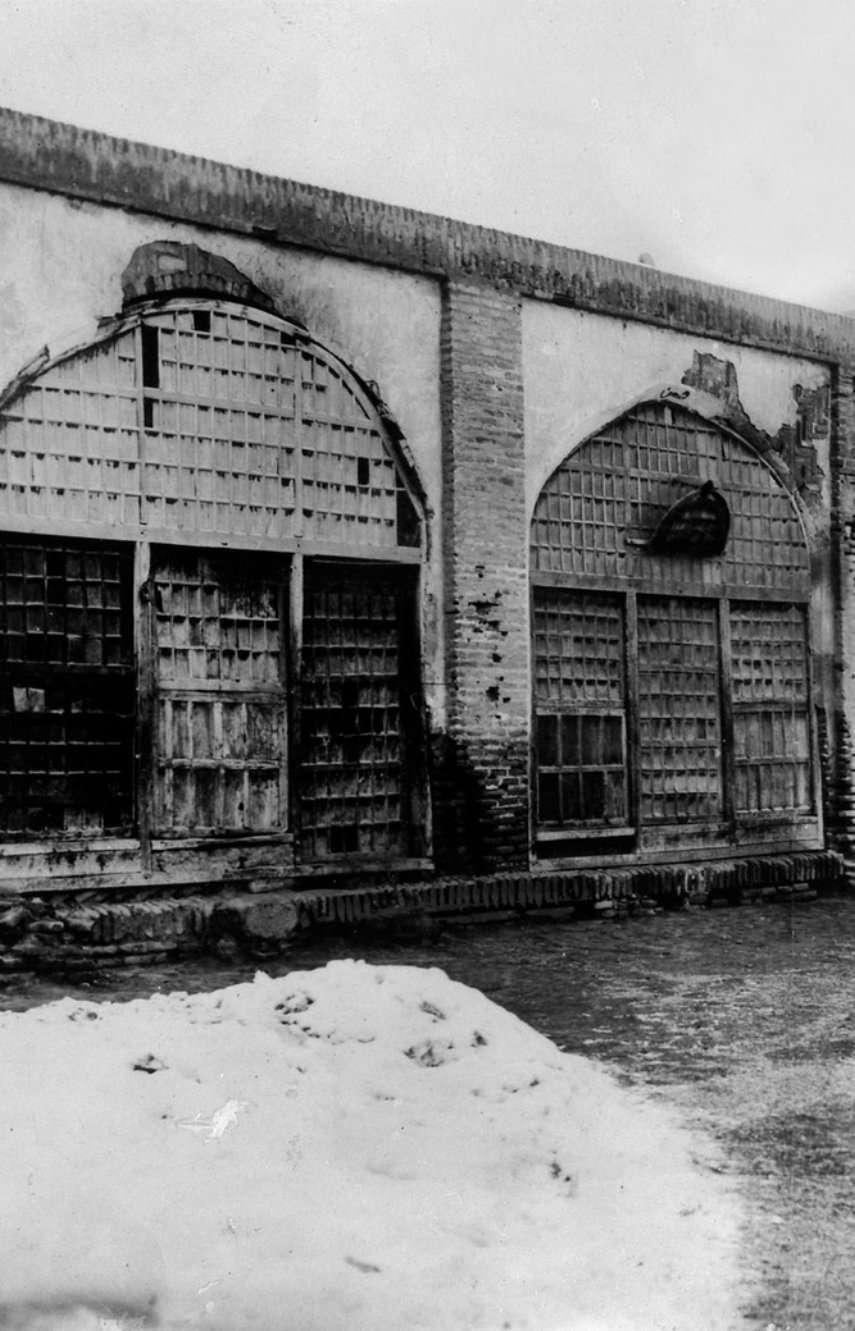
> 為了祂，成千上萬的殉道者欣然赴死。巴比教徒在德黑蘭遭遇大屠殺的那一天也許是整個世界歷史上絕無僅有的。那一天在德黑蘭的街道和集市上發生了圍觀群眾也許永遠無法忘記的景象……孩子們和女人們一邊前行，一邊高唱經文：‘確然，我們來自上帝，也將歸向上帝。[13]

心靈的純潔和道德勇氣，恰好契合大多數西方觀察者所宣導的理想主義。到19世紀時，巴孛所宣教的波斯，這個曾經一度世界上最偉大的文明之一，已墮落到了讓外國來賓絕望和鄙視的地步。一群無知的、冷漠的、極度迷信的人民，乃是極度腐敗的穆斯林教士和殘酷的卡紮爾王朝沙王政權的受害者。大體說來，什葉派伊斯蘭已墮落為一群迷信和愚昧的教條主義的烏合之眾。當權者一時的心血來潮，即可左右人民的生命與財產安全。

就是這麼一個社會，巴孛呼籲其反省和自律。一個新時代已經來臨；上帝要求心靈的純潔勝過宗教的例行公事，而那種心靈的純潔是一種必須與日常生活所有方面的潔淨相輔相成的內心狀態；真理不是靠盲目的模仿而是靠

著親身實踐、祈禱、默思和解脫貪欲才能達成的目標。穆拉•侯賽因－伊－布希魯伊(Mullá Husayn-i-Bushrú'í)描述他與巴孛的初會對他個人的影響的文字，充分體現了西方作家戈賓諾、布朗和尼古拉斯等人後來從追隨巴孛的倖存者那裡聽聞的敘述的性質：

> 我覺得自己充滿了如此的勇氣和力量，即使這個世界、這世上所有的民族和君主都起來反對我，我也能夠承受他們的攻擊，哪怕我孤身一人，也將剛強不屈。這宇宙仿佛只是我掌握中的一把塵土。我仿佛是那加百列化身的聲音，召喚全人類：覺醒吧，看吶，晨光已破曉！[14]



巴孛殉難的塔布里茲兵營廣場

歐洲觀察者在巴孛殉道許久以後訪問波斯時，仍然為這個國家的巴哈伊社團在道德上的出類拔萃所震撼。布朗在向西方讀者解釋巴哈伊教育活動在波斯民眾中取得的成功時，拿基督教傳教士的無效努力做了對比，他這樣說：

> 然而對於西方觀察者來說，最強烈地吸引其注意力的是巴比教徒的極度真誠，他們那毫不畏懼因自己的宗教而遭遇死亡和酷刑的大義凜然，他們對於自己信仰之真理的確信不疑，他們那普遍受到敬佩的善待人類、特別是善待其教友的行為。[15]

巴孛這個人物也強烈地吸引著浪漫主義所喚醒的審美情感。在祂的國人之中，除了那些地

位因祂的使命而受到威脅的人，所有見過祂的人留下的現存敘述都眾口一詞地描述祂這個人和祂的一舉一動的非凡之美。祂的聲音，特別是在祂吟唱祂所啟示的書簡和禱文的時候，自有一種征服人心的甜美。甚至祂的衣服和祂的簡樸家居所體現出的雅潔程度，似乎也反映著那如此強烈地吸引其訪客的內在靈性之美。

巴孛生前的一些個人物品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巴孛思想的獨創性和祂所選擇的表達方式。歷經19世紀所有的跌宕起伏，歐洲思想仍然繼續執著於「命運之人」這一理想——命運之人全憑自己那無拘無束的天才的創造性力量，就能為人類事務劃出一條新的軌道。在世紀之初，拿破崙·波拿巴似乎是這一現象的標誌，就連他對這一理想的背叛所帶來的幻滅都未能擊退個人主義的洪流——而浪漫主義運動為這個世紀、為我們自己留下的主要遺產，正是個人主義。

在巴孛的著作中出現了一以貫之的探索宗教真理的新方法。其毫不遮掩的大膽，是祂在統治19世紀波斯所有嚴肅對話的蒙昧主義穆斯林神職人員中間激起強烈反對的主要原因之一。與這些極具挑戰性的理念相得益彰的，是

其所採用的極具創新性的語言。

在其文學形式上，阿拉伯語具有一種近乎催眠功效的美感——這種用《古蘭經》的語言傳達的美感達到了崇高的境界，古往今來所有的穆斯林都認為這是凡人無法模仿的。對於所有的穆斯林來說，無論他們所屬的教派、文化和民族如何，阿拉伯語都是近乎完美的啟示之語言。《古蘭經》之神聖起源的證據，主要的並不在於其文學特色，而是在於其經文具有改變人的行為和態度的能力。儘管巴孛與基督耶穌和穆罕默德一樣，幾乎沒有接受過什麼正規學堂教育，祂卻根據論題的需要，交替使用阿拉伯語和祂的母語波斯語。

對於他的聞道者來說，巴孛的靈性權威的最戲

劇性徵象是：人類的耳朵在1200多年裡第一次有幸又聽聞那無法模仿的啟示的聲音。實際上，在一個重要的方面，《古蘭經》已被超越。充滿了震動人心之力量的書簡、默思和禱文，毫不費力地從巴孛的唇舌間流淌而出。在僅僅兩天的時間內，祂的著作就在數量上超過了整本《古蘭經》——穆罕默德在23年的時間內傾吐的先知話語的成果。在反對祂的神職人員之中，沒有人膽敢接受祂的公開挑戰：

> 真確的，我們已使啟示之言作我們給你的訊息的證詞。也就是說，在《古蘭經》裡，真主已經明確地提出，經書之威力的奇跡就是祂唯一的證據。你們能夠寫出跟這些經文匹配的一個字母嗎？那就拿出你們的證據吧……[16]

然而，儘管巴孛有能力選擇使用傳統形式的阿拉伯語，在祂的訊息需要以其他方式傳達時，祂卻能毫不猶豫地拋棄這些阿拉伯語常規。每當祂發覺現有的詞語已不足以表達祂積極宣導的靈性真理的革命性新概念，祂便自由地創造新詞、新的語法結構和已有表達方式的其他變體。飽學的什葉派穆智台希德在塔布里茲審判巴孛時(1848年)指責祂違反語法規則，而巴孛則提醒那些追隨祂的人說，上帝之言是語言的創造者，一如上帝之言亦是其他一切事物的創造者，而上帝是根據祂的目的來塑造祂的語言。[17]經由上帝之言的力量，上帝說有，一切便有了。

這原則與先知啟示的宗教一樣古老——甚至可以說，這原則是先知啟示的宗教的核心所

在：

>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萬物是借著祂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借著祂造的。……祂在世界，世界也是借著祂造的，世界卻不認識祂。[18]

巴哈歐拉在其主要著作《四谷經》(The Four Valleys)的某一段裡，提及上帝使者來臨時人類所作出的反應蘊藏著何等深意。祂引用波斯詩人的詩句說：

> 有則故事講述了一位神秘悟道者在一位博學的文法家的陪同下開始了一個旅程。他們來到莊嚴之海的岸邊。悟道者全然信任上帝，立即縱身跳進波濤之中，可文法家卻困惑地站在那裡，迷失在宛如

寫在水上的字句般的思緒裡。神秘者對他呼喊：你怎麼不跟上？文法家回答說：兄弟啊，我能怎麼辦呢？因為我不敢前進，我就必須再次返回。於是，悟道者喊道：拋棄你從西拜韋伊、高萊韋伊、伊本-伊－哈吉卜、伊本-伊－馬利克那裡學到的東西，越過水面。

人必須裝備的，是超脫，而不是語法規則：因此，歸於虛無吧，然後越過此海而毫髮無傷。[19]

對於那些年輕的、熱切響應巴孛之訊息的神學院學生來說，巴孛所用語言的創新性不但沒有成為他們理解其訊息的障礙，反而標誌著巴孛所宣告的神聖使命的另一難以抗拒的特色。這

種語言的創新性挑戰著他們去打破熟知的認知模式、去擴展其智識能力、去發現這新啟示中真正的靈性自由。

對於巴孛後來的歐洲崇拜者來說，無論祂著作中的某些內容多麼令人困惑，他們都將祂視為一個獨一無二的人物，一個在自己的靈魂裡發現了超絕的新現實之異象的人，一個毫不猶豫地為義之所向而採取行動的人。他們的大多數評論都趨向於反映維多利亞時代的二元論思維框架，並被描述為這些作者們對於那些他們認為重要的宗教和文化現象所作的科學性的觀察。例如，在劍橋學者愛德華・格蘭維爾・布朗的《一位旅行者的敘述》*A Traveler's Narrative*中，他不厭其煩地解釋自己為什麼要花費如此心血研究巴比運動：

> 在此，他[宗教學生]可以深入思考那些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演變成英雄或半神卻尚未被神話和寓言遮蔽的人物；他可以通過那些同時發生卻又相互獨立的證詞，審視那離奇而突然爆發的熱情、信仰、虔誠的奉獻和不屈的英勇——甚至狂熱(如果你堅持要用這個詞的話)，而我們的積習總是將那種爆發與人類的早期歷史聯繫在一起；一言以蔽之，他甚至可以見證一種完全可能在世界各大宗教中贏得一席之地的信仰的誕生。[20]

然而，這種現象所產生的星火燎原般的影響——即使對於一位謹慎而經過科學訓練的歐洲知識份子來說，即使在數十年後——在布朗於1892年、即巴哈歐拉逝世的那一年發表

的主要文章 *世界宗教體系* 的結語中，仍然可見一斑：

> 我相信我已充分說明了這個宗教所要達成的目標，這些目標絕不偏狹，堪配其創始人及其追隨者崇高的自我犧牲和英勇。正是這些人的生命與死亡，他們那永不消減的希望，他們那永不冷卻的熱愛，他們那永不動搖的堅定，為這一奇妙的運動打下了它獨一無二的品格的烙印……他們所承受的，並非容易承受之事；他們認為值得為之犧牲生命的東西，當然值得我們去嘗試理解。我既未提及巴比信仰將對未來產生的巨大影響——對此我深信不疑，亦未提及巴比信仰可能為一個垂死的民族注入的生命的氣息；因為無論其成功還是失敗，巴比殉道

者的英雄精神都是一種永恆的、不可磨滅的東西。[21]

這種印象太強大了，以至於大多數西方觀察者過於迷戀巴孛其人其事，而忽略了巴孛的目的。布朗本人雖然因其調查而成為研究巴比運動的第二代歐洲權威中的佼佼者，卻仍然未能理解巴孛的使命是為巴哈歐拉的工作鋪設道路，亦未能理解巴哈歐拉在這條道路上所取得的成就代表著巴孛的最終勝利，證明著巴孛的正確[22]。法國作家尼古拉斯(A.L.M. Nicolas)則幸運得多，其部分原因僅僅是因為他活得足夠長，因而得益於更廣闊的歷史視野。他最初是敵視巴哈歐拉取代巴孛的，但最終卻理解了巴哈伊的這種觀念，即巴孛是兩位接連出現的上帝顯聖者之一，這雙顯聖者的聯合使命是促成

地球的統一與和平。[23]

這一簡短的歷史框架將有助於理解巴孛教義的要旨。從某種意義上講，祂的訊息是足夠清楚的。正如祂反復強調的，祂的使命期的目的和祂所有努力的目標是宣告上帝將昭示天下者(Him Whom God will make manifest)——人類歷史上各時代的宗教經書所預言的上帝的普世顯聖者——即將來臨。實際上，巴孛所啟示的所有律法都意在幫助祂的追隨者做好準備，在那應諾者來臨的時候，能夠認出祂並服務於祂：

> 以上帝將昭示天下者的名義，我們已種植了巴揚花園［即巴孛啟示］，並已恩准你們居住其中，直至那上帝將昭示天下者顯現之時；……[24]

巴孛的使命期是要幫人類做好準備，迎接一個轉變時代的來臨——這是聆聽祂教誨的那一代聞道者所能理解的最重要的事情。他們的責任是淨化自己的心靈，這樣他們就能夠認出全世界都在等待的那個應諾者，並為上帝之國的建立而服務。因此，巴孛才是普世期盼已久的上帝之化身將要從中出現的門。

> 在上帝將要昭示天下者出現時，博學者中最出類拔萃者和人間最卑微者，都要受到審判。多麼常見啊，地位最低微的人

承認了真理，而最博學的人卻仍陷於障蔽之中。[25]

一篇裝裱過的巴孛書簡

值得注意的是，巴孛最初提及那應諾的拯救者，是在祂的第一部主要著作《伽瑜姆勒・阿斯瑪》(Qayyúmu' l-Asmá')中，其中部分段落啟示於祂宣示自己使命的那個夜晚。整部著作從表面上看是《古蘭經》中《約瑟章》的一個評注集，巴孛解釋說《約瑟章》預示著神聖的約瑟——那即將兌現《古蘭經》及過往所有其他經書所承諾要來的「上帝之遺跡」"Remnant of God" ——的來臨。《伽瑜姆勒・阿斯瑪》比任何其他作品都更有力地向巴比教徒證明了其作者所自稱的先知身份，並在巴比執教期的早期，充當著巴比社團的《古蘭經》或《聖經》的作用。

> 東方之民和西方之民啊！願你們敬畏上帝，就真約瑟之聖道，不要將祂賤賣，換

> 取你自標的低價或私有的微財，好讓你們能夠實實在在地蒙祂讚美，被歸入靠近此門肅立的虔誠者之列。[26]

1848年，就在巴孛殉道前兩年，祂啟示了《巴揚經》，這部書將被用作祂律法之主要典藏和祂神學教義的最全面表述。從本質上講，這部書是給那即將來臨的應諾者的一份更大的獻禮，只是在這部書裡那應諾者有了不一樣的名稱：上帝將昭示天下者。這個名稱在書中出現了約300次，幾乎在每一章中都會出現，無論各章表面上的主題是什麼。《巴揚經》及其包含的全部內容都取決於上帝將昭示天下者的意志；整部《巴揚經》所包含其中的實際上不過是對祂的讚頌；《巴揚經》是其作者送給那上帝將昭示天下者的一份微薄的禮物；到達祂的尊前就

是到達上帝的尊前。祂是「真理之陽」,「真理之臨」,「真理之點」,「真理之樹」[27]:

> 我憑著上帝那最崇高、最榮耀者的最神聖本質起誓,當那上帝將昭示天下者顯現時,精讀一千遍《巴揚經》不如精讀那由上帝將昭示天下者所啟示的一行經文。[28]

有關這個主題的某些最強有力表述,就包含在巴孛直接寫給上帝不久將昭示天下者的書簡中:

> 從徹底的空無中,偉大而全能的主宰啊,祢已通過祢的大能的天威,造生我並提升我來宣揚這啟示。除祢之外,我無所信

賴；除祢的意志外，我別無其他意志。祢真確是那滿足一切者，在祢身後屹立著真正的上帝，那守護萬物者。[29]

除了這一中心主題外，巴孛的著作對於那些即使精通波斯語和阿拉伯語的西方學者來說，還有一個令人卻步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這是因為這樣一個事實：這些著作常常闡述什葉派伊斯蘭神學的細枝末節，因為這些細枝末節對於祂那些思維完全局限在這個狹隘的智識世界、無法接受其他思想的聞道者來說是無比重要的。隨著巴哈伊社團繼續擴大、其對於社會生活的影響漸趨鞏固，研究這些著作中有序組織起來的靈性原則，無疑將佔據幾代博士候選人的精力。對於那些率先接收到這些著作的巴比教徒來說，它們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在於它

們展示了巴孛能夠駕輕就熟地闡述最深奧的神學問題，而同樣是這些神學問題，卻要那些反對祂的神職人員耗費許多年去刻苦學習和爭論。其作用是幫助巴孛的追隨者消除盛行的伊斯蘭神學系統賴以存在的智識基礎。

巴孛著作的一個相對容易理解的方面是其中包含的律法。顯然，巴孛所啟示的是一個完整律法體系的諸多根本要素，既涉及日常生活問題，也涉及社會組織問題。任何一個西方讀者，甚至是對巴比教歷史有粗略瞭解的西方讀者，都會立即想到這樣一個問題：這一雖然鬆散、卻完全可能統領數百年的律法體系，很難與巴孛一再重申的、上帝將昭示天下者很快將要出現並建立上帝之國的基礎這一預言相互調和。雖然沒有人知曉祂來臨的確切時刻，巴孛卻向

祂的幾位追隨者保證，他們將活到看見那上帝將昭示天者，並為祂服務。隱語第九年、第十九年更是增強了巴孛社團內部的期待之情。

要瞭解《巴揚經》之律法在當時的重要性，我們必須向別處尋找答案。伊斯蘭的常規，特別是在什葉派的形式中，已變成須謹小慎微地服從那些由一代代穆智台希得無休無止地闡釋過又僵化執行的瑣細訓令和規定。伊斯蘭教教法體系實際上是神職人員的權威的化身，它不僅對於廣大民眾來說是權威的化身，對於君主政體本身來說亦是如此。它包含了人類所需要或能使用的一切。上帝之口已封起，直到諸天撕裂、山巒消逝、海洋沸騰、號角將死人從他們的墳墓裡驚醒、上帝將在成群列隊的天使的包圍下降臨的審判日。

對於那些承認巴孛的人來說，《巴揚經》的律法條款，拋開了整個伊斯蘭教法體系，從而一舉粉碎了神職人員的體制性權威。上帝重新發言了[30]。面對一個自稱是以先知名義行事的過時宗教集團的挑戰，巴孛通過全面行使伊斯蘭專為諸先知保留的權威與權力，來證明自己的主張的合法性。這一行為比祂使命期內的任何其他行為都大膽，而正是這種大膽讓祂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可是其成效卻是解放了祂的追隨者的思想和心靈，這種影響力是無與倫比的。《巴揚經》的許多律法不久將被巴哈歐拉在《亞格達斯經》[31]中所制定的律法取代或大改，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從將接受新啟示的廣大巴比教徒的眼光來看，只要巴孛的目的達到了，其律法被取代或大改其實並不重要。

有鑑於此，巴孛處理某些問題的方式就值得注意了：有些問題在祂的使命期內並不存在，但是如果不予處理，就有可能變成其事業的嚴峻障礙，因為這些問題頑固地紮根在穆斯林的宗教意識中。例如，聖戰的概念，這是《古蘭經》中定下的誡命，是所有身體健全的男性穆斯林應盡的義務，履行這一義務在伊斯蘭社會中歷來處於重要地位。在《伽瑜姆勒•阿斯瑪》中，巴孛審慎地提及一種形式的聖戰，那是祂所自居的先知地位才具有的特權之一。然而，祂規定任何參與聖戰的行為都以祂本人的許可為先決條件——而祂，卻拒絕給予這種許可。接下來，《巴揚經》這部正式頒佈的、標誌著新啟示之律法的著作，對於一個長久以來貌似關乎履行上帝之意志的核心問題，卻只是一筆帶過。因此，巴孛的追隨者在去波斯各地宣揚新啟示

時，才覺得在受到攻擊時有權自衛，但是他們的新信仰卻並不包括「為強迫他人改變宗教可以發動戰爭」的舊伊斯蘭訓令。[32]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些嚴苛的律法，其意圖顯然是要製造一種靈性鼓動的效果，就此而言它們是極其成功的。由於巴孛清晰地預見到了祂所開啟之航線的方向，祂幫助其追隨者們做好準備，通過一種包含了祈禱、冥想、自律與和睦的社會生活的嚴苛修行之道，來迎接他們投身巴孛使命所將帶來的不可避免的結果。

然而，《巴揚經》的規定遠遠不止是那些當務之急。因此，當巴哈歐拉承擔起建立新啟示的道德和靈性基礎這一任務時，祂的建設工作直接就在巴孛的工作成果上進行。《亞格達斯經》，

巴哈伊紀元的母書，雖然並未以一套系統法典的形式呈現，卻為巴哈伊集成了其信仰的主要律法。有關個人行為和社會實踐的指引，一段段架構出來，召喚讀者去迎接一種具有挑戰性的、有關人之本性和使命的新觀念。一位19世紀的俄國學者是最早嘗試翻譯此書的人之一，他將巴哈歐拉手書《亞格達斯經》比作一隻鳥，一時翱翔於天國的巔峰，一時降落到塵世，觸及日常需要的樸素問題。

任何人只要審視《亞格達斯經》的條款，就能立即發覺它與巴孛著作的聯繫。《巴揚經》中與未來時代無關的律法全部被廢除了。其他規定則被重新制定，通常是放鬆其要求和放寬其實施。《巴揚經》仍有些其他條款被幾乎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這方面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巴哈歐拉

採納了巴孛的曆法，其中每年有19個月，每月有19天，並設定了四或五天的「閏日」，用來進行社交聚會、慈善之舉、親友相互贈送禮物等。

除了《巴揚經》的具體律法之外，巴孛的著作還包含著新的靈性視角和觀念的種子，這些都將賦予全世界巴哈伊事業以活力。從穆斯林普遍接受的「真主唯一且超驗」的信仰出發，巴孛一針見血地切中12個世紀以來伊斯蘭歷史中積累下來的、相互矛盾的教條和神秘主義猜想的大雜燴的要害。上帝不僅是唯一和獨一的；祂還是徹底不為人類所知的存在，且將永遠如此。在萬物的創造者和創造者的創造界之間沒有直接的連結。

接近存在界背後的神聖實在的唯一途徑，是通過上帝派來的承前繼後的信使。上帝以這種方式向人類「顯示」祂自己，正是在上帝的顯示者這個聖人身上，人類的意識可以覺知到神聖的意志和神聖的屬性。經書裡所描述的遇見上帝、認知上帝、崇拜上帝、服務上帝，是指靈魂認識到新啟示的反應。上帝之使者的來臨本身就是審判日。因此，巴孛否認蘇菲信仰所認為的通過冥想和深奧的修行個人可能與那神聖存在神秘融合的信條：

> 不要再自欺了，你們修習美德不是為了上帝。因為如果你們真的是為上帝做你們的工，你們就將為上帝將昭示天下者做你們的工，就將弘揚祂的名。……深思片刻吧，以免你們被那帷幕隔絕，使你們見不到祂，那啟示之陽。[33]

巴孛不僅遠遠甩開了諸先知的「承前啟後」終結於穆罕默德的使命期這一正統伊斯蘭概念，還宣稱上帝的啟示是一種循環往復的、永不終結的現象，其目的是為了達成人類的逐步訓練和發展。隨著人類的意識認識和回應每一位神聖使者，人類自身潛藏的靈性、道德和智識能力將穩步發展，就這樣為其認識上帝的下一位顯聖者做好準備。

上帝的顯聖者——包括亞伯拉罕、摩西、耶穌、穆罕默德在內——在本質上是同一的，儘管其人身不同，其關於不斷演進之人類社會的社會教義亦有差別。每一位顯聖者都可以說是擁有兩種地位：人性和神性。每一位顯聖者都帶來了兩種證據，來證明自己的使命：祂本人和祂所教導的真理。這兩種證據的任何一種，對於

任何真誠探詢的靈魂來說，都是充分證據；關鍵是動機的純潔，而這種品質是巴孛的著作中格外重視的。通過信仰、理性和行為的合一，每個人都能夠借著上帝的確認達到「為自己所謀者，亦為他人謀」的發展境界。

那些真誠相信使者、追隨使者之信仰的人，都在這信仰的幫助下做好準備，去認識來自同一神聖源頭的下一個啟示。因此他們是上帝之言的管道，借助這管道上帝之言持續實現其在人類生活中的目的。這是過往宗教中所說的復活的真正含意。類似地，天堂和地獄不是地方，而是靈魂的狀態。一個人認識了上帝的啟示並開始了完善自身本性的進程，就進入了這個世界的樂園，而這個進程是永無止境的，因為靈魂本身是不滅的。同樣地，上帝的懲罰是「否認上

帝的啟示、拒不服從律法」這一行為本身所固有的，因為任何人都無法逃脫律法的運行。

巴孛著作中的這些概念，可以上溯到早期宗教經書中的多處明示或暗示。然而，上文所述清楚地表明，巴孛將這些概念放在一種全新的語境中，並從中揭示了不同於以往任何宗教體系所作的釋義。

巴孛將祂的教義形容為打開《古蘭經》和《新約》中所說的「密封的美酒」。「上帝之日」所預示的不是世界末日，而是循環更新。地球將持續存在，人類種族亦將持續存在，並且人類的潛能將因回應那神聖者持續不斷的脈動而與時俱進地展現出來。所有民族在上帝眼中都是平等的，人類種族進步到上帝將昭示天下者即

將來臨的今時今日，既不需要也無餘地容納特權神職階層。祂鼓勵信徒看清經書中以往被視為超自然或魔幻性事件的段落的寓言性意圖。正如上帝是同一位，現象性的實在也是同一個由那神聖意志激發的有機整體。

這種關於宗教真理之本質的漸進性和高度理性的觀念，與19世紀什葉派伊斯蘭所表述的觀念，實在有天壤之別。正統什葉派的可能後果，在今天伊朗的伊斯蘭共和國政權中已曝露無遺，正統什葉派的最根本做法是按字面意思去理解《古蘭經》，執著於一絲不苟地遵守伊斯蘭教法，相信個人的救贖來自「效法」(taqlíd)神職導師，篤信伊斯蘭是真主給這個世界最後的、滿足一切的啟示。對於這種如此僵化的、一成不變的思維定勢來說，哪怕是對巴孛的教義

進行一絲一毫的認真思考，都將產生難以想像的後果。

巴孛的教義，比如《巴揚經》的律法，不是以組織有序的闡述形式來表達的，而是蘊含在祂那鴻篇巨制之中闡述廣博的神學和神秘問題的篇章內。是巴哈歐拉將這些分散的真理和準則，比如《巴揚經》中的律法，吸收、重構並融合在自己的著作中，形成了一個統一的、連貫的信仰系統。此題目遠遠超出了本篇短文的範圍，但是讀者在巴哈歐拉的主要教義著作《毅剛經》中不僅能找到巴孛教義的迴響，還能發現其核心觀念的一以貫之的詳細闡述。

最後，巴孛著作的一個顯著特色是它預示了「西方各族人民」所要承擔的使命，並表達了對於完成這一使命所需的品質的敬意，這也成為巴哈伊信仰和歷史的一個重要元素。這也和祂所處時代的伊斯蘭世界盛行的對於西方人和異教徒的公然鄙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例如，西方的科學進步格外受到讚賞，思想開明和重視清潔這兩項巴孛認為西方人整體表現出來的趨向，也是如此。祂的欣賞並非籠統之詞，而是觸及郵政系統和印刷設備這樣的凡俗事務。

在巴孛使命期的初始，《 伽瑜姆勒•阿斯瑪 》號召「西方各族人民」起而離開自己的家園去弘揚上帝之日：

> 成為上帝那同一且不可分割的宗教的真兄弟吧，擺脫分別心，因為上帝真的希望你們的心能夠成為明鏡，照耀你們信仰中的兄弟，這樣你們就會發現在他們身上有你們自己的鏡像，在你們身上有他們的鏡像。這是那全能上帝的真道……[34]

巴孛在塔布里茲受審期間，曾向一位為祂醫治刑傷的英國醫生表示，終有一日西方人也將擁護祂使命的真理，對此祂充滿信心。這一主題在巴哈歐拉的著作中有了更強烈的表達。一系列書簡都在召喚歐洲統治者，如維多利亞女王、拿破崙三世，威廉一世、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等，去秉公審視上帝之道。英國君主因其政府在整個帝國境內廢除奴隸制度及建立憲政而

受到盛讚。在這些書信中所包含的最非同尋常的主題也許是一篇給美洲統治者及其境內各共和國總統的近乎諭令的召喚。祂號召他們用正義之手給受侵害者敷傷，用他們的主的誡命之杖去粉碎那興起的壓迫者。[35]

預見到西方各國各民註定要為建立新世界秩序之機構而做出決定性的貢獻，巴哈歐拉寫道：

> 在東方，祂的啟示之光已破曉；在西方，祂的統權之象已顯現。人們啊，在你們心中對此深思吧……[36]

為巴孛和巴哈歐拉之使命的這一獨特方面奠定基礎的責任，後來被轉移到阿博都－巴哈身上。在1911－1913年訪問西歐和北美期間，阿

博都－巴哈高度讚揚西方所取得的物質成就，並迫切地呼籲應有靈性文明的根本原則與之相平衡。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回到聖地的阿博都－巴哈起草了一系列書信，致美國和加拿大的一小群巴哈歐拉追隨者，號召他們起而向地球上最遙遠的角落去傳揚巴哈伊福音。國際形勢一有所緩和，這些巴哈伊就開始響應阿博都－巴哈的號召。在接下來的數十年中，全世界巴哈伊社團的數量激增，許多其他巴哈伊社團的成員都以這些美國巴哈伊為楷模。

阿博都－巴哈也賦予了北美信徒一大任務：為巴哈歐拉所構想的管理巴哈伊社團事務的行政機構之民主選舉奠定基礎。巴哈伊信仰的現

行行政體系的整個決策架構，無論是在地方級別、國家級別還國際級別，都起源於由美國和加拿大信徒建立的這些簡易的磋商會。

然而，巴哈伊看到了一種並行的回應這一神聖諭令的模式——儘管這神聖諭尚未獲得普遍認可，但是西方各國在本世紀促進全球和平之種種舉措上卻發揮著越來越大的領導力。尤其是在創立一個國際秩序體系的舉措中，更是如此。在巴哈伊信仰的聖護守基・阿芬第的著作中，「不朽的伍德羅・威爾遜」因為這方面的遠見灼識和為實現這一願景而努力的孤勇而贏得了讚譽。

下頁照片：1912年11月23日在紐約大北方酒店以阿博都-巴哈名義舉辦的宴會。祂對歐洲和北美的訪問有助於鞏固那裡早期的巴哈伊社團，並最終促成了巴哈伊信仰在世界各地的擴展。

巴哈伊們也同樣意識到，歐洲各國政府、美國政府、加拿大政府和澳大利亞政府等，正在人權領域發揮領導作用。巴哈伊社團直接得益於這方面的進步：在巴列維國王和伊斯蘭共和國的統治下反復出現的迫害浪潮中，巴哈伊社團代表伊朗的教友進行了成功的干預。

以上所述絕不意味著巴孛或巴哈歐拉對歐洲文化或北美文化予以不加批判的讚賞，亦不意味著祂們認可這些文化賴以存在的意識形態基礎。事實遠非如此。巴哈歐拉以嚴峻的口吻警告說，如果西方文明繼續其無節制的道路，那麼苦難與毀滅將降臨整個人類。在訪問歐洲和美洲期間，阿博都－巴哈以悲痛的語言召喚祂的聞道者們趁現在還來得及，將自身從種族民族歧視中解放出來，不要沉溺於物質主義之

中，因為沉溺於物質所帶來的不為人知的危險威脅著他們的國家和全人類。

今天，巴孛使命開啟一個半世紀後，祂的生平和話語的影響力已表現在一個由地球上各種背景的成員組成的全球社團中。大多數巴哈伊朝聖者抵達其信仰的世界中心之後的第一個舉動就是沿著那條鮮花夾道的路徑，走向那珍藏著巴孛遺骸的精美陵殿，然後拜倒在祂安息之處的門檻前。他們堅信在未來的歲月裡，「朝聖諸王」會滿懷崇敬地走上那些美輪美奐的階梯，從「上帝之山」腳下來到巴孛陵殿的入口，將他們王權的徽章敬獻在這同一道門檻前。今天，在朝聖者所在的國家裡，無數來自不同背景、說著不同語言的孩子起名塔荷蕾、庫杜斯、侯賽因、紮伊納蔔、瓦希得、阿尼斯——

那些都是巴孛殉道同伴的名字，正如始建於2000年前的羅馬帝國的土地上曾有孩子承續基督門徒那陌生的希伯來名字。

巴孛的遺體歷盡艱難險阻，才從波斯轉移到巴哈歐拉為其先驅所選定的安息之地，這個選址本身對於巴哈伊世界而言具有重大的意義。縱觀歷史，殉道者的鮮血始終被視為「信仰的種子」。在這正在見證人類之逐漸統一的時代，巴比殉道者的鮮血已變成了個人信仰的種子，和行政機構的種子——這些行政機構，用守基・阿芬第的話來說，是巴哈歐拉所構想的世界秩序的「核心和模式」。巴孛陵殿處在卡梅爾山巴哈伊信仰之行政中心建設區的最高位置上，它所象徵的正是這種關係。

位於海法的巴孛陵寢

今天，川流不息的巴哈伊朝聖者們在進入這些莊嚴之境的時候，幾乎都會回想起150年前巴孛向祂那寥寥可數的追隨者所說的話——他們全都被剝奪了權力和財富，且大多數註定要跟祂一樣犧牲生命：

> 上帝之日的秘密現在隱藏著。這秘密既不能洩露，也不能揣測。那日的新生嬰兒將勝過今日最智慧、最德高望重的人，那時最卑微、最無學的人將超出今時最博學、最成績斐然之人的理解力。分散到這土地的四面八方吧，用堅定的腳和聖潔的心，為祂的來臨鋪好道路。不要介意你們的虛弱和脆弱；將你們的目光凝聚在主，你們的上帝，那大能者不可戰勝的威力上……以祂的名奮起吧，全然依賴祂，堅信那最終的勝利。[37]

註釋

1 穆拉•侯賽因－伊－布希若伊。

2 巴孛誕辰紀念日是每一巴哈伊年度第八個新月出現後的那一天，這一天在10月中旬和11月中旬之間推移；巴孛宣示日則是5月23或24日；巴孛的殉道日則是7月9或10日。

3 阿諾德•湯因比，《歷史研究》第8卷，（倫敦：劍橋，1954），117頁。

4 守基•阿芬第，《巴哈歐拉的世界秩序：書信選集》第2版，（威爾梅特：巴哈伊出版信託，1974），123－24頁。

5 這新穎的釋義來自侯賽因•丹尼士醫生。

6 守基•阿芬第，《神臨記》，（1944；重印，威爾梅特：巴哈伊出版信託，1974），56頁，及《巴哈伊世界》第9卷,1940-1944(1945；重印，威爾梅特：巴哈伊出版信託，1981)，588頁。

7 伊朗穆斯林多年來在攻擊巴哈伊信仰時頑固地堅持使用“巴比”一詞，似乎是最初19世紀神職反對者所煽動的敵對精神的反映。

8 雪萊，《被解放了的普羅米修士》，第4本第2幕，569-78頁。

9 愛默生，“神學院獻辭”，《愛默生文選》，S.E.瑞徹爾編（波士頓：霍頓•米夫林, 1960）, 115-6頁。

10 丁尼生，《國王敘事詩：亞瑟的消逝》，第2卷，408-10頁。

11 穆罕默德－伊－紮蘭迪（納比勒－伊－阿紮姆），《破曉群英傳：納比爾記述巴哈伊啟示的早期歲月》，由守基•阿芬第將之從波斯語翻譯成英語（1932；重印，威爾梅特：巴哈伊出版信託，1974），93頁。

12 巴孛跟一個年輕的信徒一起，被用繩子吊在塔布里茲城堡的一面院牆上，一個亞美尼亞基督教兵團奉命向這兩位囚徒射擊，但是這兵團的指揮官卻表示對執行這一任務很是不安。750支步槍射擊的煙霧消散後，擠滿了屋頂和牆頭的圍觀者人群幾乎亂成一團。巴孛的同伴站在牆根處，毫髮無傷，而巴孛本人卻消失不見了。群射只是

打斷了繩子而已。巴孛已回到原來關押祂的囚室裡，目的是完成祂對書記員的指示，此前祂的口述被獄卒打斷了。亞美尼亞兵團立即離開了城堡，拒絕參與此項行動。當時圍觀群眾都因他們眼中的這一“奇跡”而處於極度興奮的狀態中，只要巴孛給他們一個鼓勵的手勢，他們就會把巴孛從祂的拘捕者手中解救出來。祂沒有利用這個機會；等到當局終於恢復了鎮靜，叫來一個穆斯林兵團執行原定的處決。此事雖然極具戲劇性，卻並非巴孛掌教期內的孤立事件。此前四年，巴孛的東道主和崇拜者，富有且大權在握的伊斯法罕省長馬努切爾·汗，曾提議派軍隊護送祂到首都，力諫軟弱的波斯統治者穆哈邁德·沙王會見巴孛，並傾聽巴孛帶來的福音。巴孛禮貌地拒絕了這一提議，不久之後馬努切爾·汗的死直接導致了巴孛的被捕、入獄和處決。

13 歐尼斯特·雷南，《門徒》，由威廉·G.哈奇森從法文翻譯成英文（倫敦：Watts & Co.，1905），134頁。這段法文原文是：Des milliers de martyrs sont accourus pour lui avec l' allégresse au devant de la mort. Un jour sans pareil peut-être dans l' histoire du monde fut celui de la grande boucherie qui se fit des Bábís, à Téhéran. “On vit ce jour-là dans les rues et les bazars de Téhéran,” dit un narrateur qui a tout su d' original, “un spectacle que la population semble devoir n' oublier jamais. … Enfants et femmes s' avançaient en chantant un verset qui dit: En vérité nous venons de Dieu et nous retournons à Lui.”此處所說的敘述者是指約瑟·亞瑟·得·戈賓諾，《中亞的宗教和哲學》第2版（巴黎：歐尼斯特·雷羅克斯，1900），304頁。

14 《破曉群英傳》，65。

15 E.G.布朗，向米隆·H·菲爾普斯介紹《阿巴斯·阿芬第的生平和教義》第2版（修正版）（紐約；倫敦：G.P. Putname' s Sons: The Knickerbocker Press, 1912），xvi。

16 巴孛，《 巴孛聖作選》（海法: 巴哈伊世界中心, 1976), 43.

17 《破曉群英傳》，321–22。

18 John 1:1–10, Authorized (King James) Version.

19 巴哈歐拉，《聖愛之召喚》（海法：巴哈伊世界中心，219），88-89頁。本文最初發表時所使用的是《四谷經》的一個早期譯本。此文已根據此著作的新權威譯文作了更新。

20 E.G. 布朗, 阿博都－巴哈之《旅行者手記：記述巴孛的故事》

前言，布朗譯（紐約：巴哈伊出版委員會，1930），viii。

21 E.G.布朗，「巴比主義」，見 *世界宗教體系*，第3版（倫敦：Swan Sonnenschein & Co.及紐約: MacMillan & Co., 1892），352-53頁。

22 似乎連布朗的客觀性也受到了蒙蔽，因為他也希望巴比教徒將他們的精力集中在波斯自身的政治改革上。當他看到巴哈歐拉將巴哈伊的精力從國內政治轉向了世界團結事業，他是有所批評的，他抱怨說……現在波斯需要的是愛他們的國家勝過其他一切的人。《努伽塔圖－卡夫》的英語前言，引自H.M.巴勒瑜茲伊 *愛德華•格蘭維爾•布朗和巴哈伊信仰*，第88頁。

23 *巴哈伊世界*，第9卷，1940-44（威爾梅特：巴哈伊出版信託，1974），584－85頁。

24 巴孛著作選，135頁。

25 同上, 91。

26 同上,49。

27 Persian Bayá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References to units and chapters 7.1; 5.7; 4.1; and 7.11.

28 《巴哈歐拉聖典選粹》，104頁。

29 同上，59頁。

30 1848年在巴達什特村會議上，對於巴孛的首要信徒來說，挑戰出現了。有趣的是，率先認識到巴孛所啟動的靈性與智識變化之巨大的卻是一名女子，才華橫溢的女詩人塔荷蕾，她後來也因自己的信仰而殉道。

31 「至聖經書」，巴哈歐拉的新世界文明憲章，1873年用阿拉伯語寫作。

32 在《亞格達斯經》裡，巴哈歐拉正式廢除了聖戰這一宗教生活內容。見威廉•S.哈徹和J.道格拉斯•馬丁 *巴哈伊信仰：新興的全球宗教*（舊金山：Harper & Row, Publishers,1985），13-14頁。

33 《巴孛著作選》，86頁。

34 同上，56頁

35 巴哈歐拉，《亞格達斯經》，第88段。

36 巴哈歐拉，《亞格達斯經後巴哈歐拉啟示之書簡》，（威爾梅特：巴哈伊出版信託，1974），13頁

37 《破曉群英傳》，94頁。